

亚洲地区华人社会教育事业的展望

(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7年

亞洲地區華人社會教育事業的展望

前 言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院慶，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舉辦一個國際教育研討會議。以《當代亞洲地區華人社會之教育展望》為大會主題。會議純為學術性質，由學院邀約國內、台灣、新加坡及本港教育學者專家三十一人，就與主題有關的專題，作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研討會於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時開始，首由大學校長馬臨教授致開會辭。馬校長闡述大學培植教育人材的責任。認為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一定要具有充實的學識和高度的專業水平。他說，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交替的時期，社會變化和科技發展都很急劇，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須是有文化抱負和組織能力的社會領導者。

繼由中大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教授以《海內外華人社會教育的共同問題》發表演講，並為大會揭示主題，強調華人社會發展以自己社會文化為本位的教育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和逼切性。杜教授講演完畢，續由國內、台灣、新加坡的學者發表專題報告，並作熱烈的討論。

各地學者所提出的論文共二十七篇，討論的範圍很廣：從不同地區教育實況的報導到未來發展前景的推測；從學制及課程的檢討到教學方法的評介；從人文思想的反省到科學教育的分析，都是極有意義而有待探究的題目。

在會中提出論文的學者，來自國內的有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校長潘炯華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袁運開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顧明遠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長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汪永銘教授、雲南師範大學前校長盧潛教授、和廣東教育學院院長梁琮芳副教授。

來自台灣的有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黃堅厚教授、台北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劉興漢教授、台北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吳靜吉教授、台北政治大學黃炳煌教授、及高雄師範學院中文研究所所長曾昭旭教授。

來自新加坡的有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東亞課程主任梁榮基博士、中文系主任周清海博士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哲學研究所馮耀明博士。

本港學者有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兼副院長譚添鉅博士、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高級講師范國先生、教育署高級教育主任李勵勉博士、中文大學教務長楊汝萬教授、研究院院長譚尚渭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博士、英語系高級講師張日昇博士、教育學院高級講師蕭炳基博士、鄭旭寧先生、余元愷博士、講師游黎麗玲博士、任伯江博士、盧林發博士、陸鴻基博士、劉誠博士、林孟平博士、李瑞全博士及副講師曾榮光先生等。

這次研討會是各地教育學者第一次作聯席會議，他們來自不同的華人社會，但在同文同種的背景之下，自由發表研究心得，暢所欲言，在和洽誠摯的氣氛下，達到學術交流、互相借鏡和彼此合作的目標，並為日後各地文教事業的共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會中所發表的多篇的論文，經作者修訂之後，復由教育學院編輯組經過格式上的整理，始行結集出版，以供教育界人士參考。本集的出版，得中文大學出版社馬桂鴻先生設計封面；教育學院院務室梁鳳霞女士負責出版聯絡及執行事宜；夏仁山先生、王適頤先生、葉碧芬女士、曹忠岳先生等協助校對，謹表示謝意。

編輯小組

杜祖貽（主席）	盧乃桂
呂俊甫	盧林發
林孟平	

亞洲地區華人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

目 錄

前言

大學培植教育人材的責任	馬 臨	1
僑內外華人社會教育發展的共同問題	杜祖貽	3
國內教育科學研究之現狀和發展	顧明遠	9
從語句完成反應看台北地區國中學生心態	黃堅厚	17
中國人文傳統與現代教育——		
重德精神與主知傾向的調和	曾昭旭	41
二程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馮耀明	55
孔恩的科學觀與科學教育的發展	李瑞全	95
新加坡華文教師教育之重點及其展望	梁榮基	105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William CHENG	117
香港雙語教育研究的理論觀點	譚添鉅	135
中文大學本科課程的文化意義	楊汝萬	141
學習技巧課程對學習效果之		
影響及其推廣之展望	游黎麗玲 鍾財文	143
關於綜合大學教學改革的幾個問題	汪永銓	151
香港電視對教育的影響	任伯江	159
新加坡華文教學的現況與展望	周清海	179
中港兩個漢語詞語統計研究之比較	蕭炳基 范 國	191

來自台灣的有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黃堅厚教授、台北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劉興漢教授、台北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吳靜吉教授、台北政治大學黃炳煌教授、及高雄師範學院中文研究所所長曾昭旭教授。

來自新加坡的有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東亞課程主任梁榮基博士、中文系主任周清海博士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哲學研究所馮耀明博士。

本港學者有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兼副院長譚添鉅博士、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高級講師范國先生、教育署高級教育主任李勵勉博士、中文大學教務長楊汝萬教授、研究院院長譚尚渭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博士、英語系高級講師張日昇博士、教育學院高級講師蕭炳基博士、鄭旭寧先生、余元愷博士、講師游黎麗玲博士、任伯江博士、盧林發博士、陸鴻基博士、劉誠博士、林孟平博士、李瑞全博士及副講師曾榮光先生等。

這次研討會是各地教育學者第一次作聯席會議，他們來自不同的華人社會，但在同文同種的背景之下，自由發表研究心得，暢所欲言，在和洽誠摯的氣氛下，達到學術交流、互相借鏡和彼此合作的目標，並為日後各地文教事業的共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會中所發表的多篇的論文，經作者修訂之後，復由教育學院編輯組經過格式上的整理，始行結集出版，以供教育界人士參考。本集的出版，得中文大學出版社馬桂鴻先生設計封面；教育學院院務室梁鳳霞女士負責出版聯絡及執行事宜；夏仁山先生、王適頤先生、葉碧芬女士、曹忠岳先生等協助校對，謹表示謝意。

編輯小組

杜祖貽（主席）	盧乃桂
呂俊甫	盧林發
林孟平	

大學培植教育人材的責任

馬 臨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首先我代表中文大學，熱烈歡迎從國內、台灣、新加坡遠道而來的學者和教育界朋友，到這裡來參加本校教育學院成立二十週年慶典的學術研討會，加強學術交流和友誼，我們深感榮幸。

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建立，兩年之後教育學院就誕生了。這是本校一個直接培育專業人材的部門，二十年來，不斷發展，教師人數由最初的七位遞增至目前的三十一位；學員名額由當年的三十一人遞增至今天的八百多人。二十年來，得到教育專業文憑的，已經三千餘人，得到文科教育碩士學位的也有一百人左右。教育學院的學員以本地大學畢業生為主，其次是國內、台灣、星馬和歐美的大學畢業生。從“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來說，二十年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然而從教育學院出來的同學，服務於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教育機構的，對於教學、研究和行政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貢獻，而且積極活躍於社會及文化服務。校友之中，除從事教學工作外，有些人同時擔任區議員、立法局議員、教育委員、教育統籌委員，也有在電視台、出版社、報社或其他專業社團工作的。在服務社會的目標下，是值得欣慰的。

現代的教育觀念，除了所謂“傳道、授業、解惑”的文化功能以外，特別強調教育的社會性。我們不應該完全接受狹隘的教育觀念，拿讀書、考試代表教育的全部。我們相信文化的傳遞和政治的更新，有賴於學校教育和其他社會活動的合作，纔能夠得到良好的效果。理想的教育事業，必須與文化、社會、環境各方

面配合，不能孤立，不能和現實脫節。教育學院畢業生能夠在教育廣大範圍裏，從事不同方向不同類型的事業工作，是符合我們的期望的。

教育學院培養出來的人，一定要具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和專業水平。在這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交替的時期，社會變化、科技發展都相當急劇，社會所需要的教育人材，必須有廣博而充實的學問基礎，同時要有嚴格的專業訓練。他們不僅是有知識的教師或行政人員，也該是有眼光、有抱負、有組織才能的社會領導者。因為他們所肩負的文化社會責任，實在非常重大。

要培植優秀的教育人材，必須安排最理想的學習環境。理想的環境應該是文化學術氣氛最濃厚、專門知識最豐富、科技設備最充足、研究實驗最認真的環境。因此，作為社會中最高學府的大學，自然要負起培養教育人材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天然條件和物質資源都很有限，唯一決定社會前途榮枯的就是人力資源能否善用。因此教育一直是大家最關心的事業，必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在這種情形下，大學直接訓練教師和行政人員，直接推動教育研究和有關的社會研究，是獲取最佳效果的安排。本校教育學院，在未來三年之內，將邁進一步，一方面開辦專精的博士研究生課程，一方面設立基層教育的訓練課程，希望能夠更全面的適應社會教育需要。

國內、台灣、香港、新加坡四個華人社會基本上都是同一文化來源，同樣具有優良的尊師重道的傳統。雖然由於政治和地域不同而演化出不同的教育制度，基本的教育觀念還是殊途同歸的。今天來自各地的教育學者，在同文同種的文化背景之下，共同探索教育發展的重大問題，彼此交流經驗，商量將來怎樣加強合作，是很有意義的事。中文大學能作為這次大會的主辦者，特別感覺光榮。

現在謹宣佈大會開始。

海內外華人社會教育發展的 共同問題

杜祖貽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本校的一位創辦人，歷史學家錢穆教授曾經說，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深厚，是其他民族不能比擬的。他還說，中華民族創造了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融凝了中華民族。所以中華民族和文化，一脈相承，綿延五六千年，不但屹立常在，而且開枝布葉。^①

在悠長的歷史中，中華民族也曾多次受到外族入侵，甚至被奪取政治和軍事的控制權，建立了新的朝代。可是堅強而又能包容的中華民族，不但將入侵的異族逐漸同化，而且也把他們帶來的文化，容納進中華文化當中，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份，逐漸形成一個豐富多元和具有獨特精神的大文化。另一方面中華民族也不斷向外移民。每當社會動亂的時候，一些生活不安的人民，就設法逃奔異域，另尋生路。就算是太平盛世，也有些胸懷奇志、勇於冒險的人，到外地去發展。不論怎樣，中華民族向外移殖的方式，總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他們移居異域，披荊斬棘，建立以中華文化為本的新社會。世代相傳，雖常有變異，但是母文化的基本精神，仍然維持不墜。

當前世界上有四個由中華民族所組成的社會：就是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和香港。其中新加坡和香港可以說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這四個海內外的華人社會，都跟中華文化維持著明顯的承傳關係。當然，這幾個華人社會，也各有特點。它們各自演化出今天的不同政治體系的過程，相信諸位都很清楚。我們可以說，今天我們所處的情境和近世紀以來中華民族的盛衰有關。在歷

史演進的過程中，一個民族不斷經歷興衰的循環，這是自然的現象。我們從歷史可以看出近代中華文化的式微，正是西方文明和科技突然興盛和政治軍事力量突告增強的時候。鴉片戰爭和中日戰爭直接的決定了香港和台灣百多年來的命運。南洋華人受馬來人的排擠而中華民族又力量不足，所以只好退而自保，成立獨立島國。^②這幾個中華民族組成的社會，不論是主流的也好，分枝的也好，都在不同的環境下，對外來壓力作出種種適應，而形成了不同政治傾向的社會體系。在這個變易的過程中，傳統的中華文化，一直用它的堅強和包容的力量，發揮調節和適應的作用。可是，也往往成為激進分子和一般政論者批評的對象。他們認為傳統的文化，是中華民族積弱落後的根源。於是崇外、自貶，就成為近世華人社會普遍的不幸現象。在受到軍事挫敗和外交屈辱的情況下，晚清的維新分子，就以鞏固國防和改善民生為首要的任務。他們以為要獲取「富國強兵」的效果，先要發展教育。而發展教育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抄襲外國教育的模式。於是建立了各種各樣的新式學校，來應付當時對各種專門人才的需求。然後再進一步，廢除科舉考試、創辦現代化的大學，和派出留學生出外深造，實行大規模借用外國的教育制度。不過，當時的方案，還是脫離不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就是說，既要學習西方的知識和技術，又要維持舊有的道德理想。後來，新派教育家對「中體西用」這個原則的信念，又起了動搖，認為這個辦法不一定行得通。因為這種教育，目的在維持「中體」，而方法卻在掌握「西用」。目的方法互不協調，是沒法產生良好效果的。於是「全盤西化」的論調，就應運而生。

後來中國政治經歷了重大的變遷，政體也因此一分為二。加上新加坡和香港，一共有四個獨特的社會，各有不同的教育體系。不過，這幾個華人社會，在教育上遇到的基本問題，還是大同小異的。不論在國內、台灣、新加坡或者香港，它們的教育措施和教育學術研究，都是倚賴外來的理論和方法。例如一九四九年以後國內的教育，早期極力仿效蘇聯，現在又借重西方。台灣的

教育，是以日治時代的制度為基礎，再加上歐美的學術模式而形成的。新加坡獨立不久，到今天仍然沿襲著英國殖民時代的教育體制。香港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它的教育方法和內容，大部份取法英美。

本來知識和學術，不必計較地域的分別。在教育發展方面，近世西方的進步比較快，我們借取他們的經驗，來補自己的不足，可以說是權宜之計。因為不同的教育理論中，總有一些普遍性的觀念，譬如教育和社會的關係，社會和個人的關係等等，都是可以參酌採用的。不過教育的普遍性，通常只限於共通經驗範疇內的概括性的觀念。因為教育並不全是實驗性的自然科學，所牽涉的範圍很廣，包括各種可以觀察得到的和不可以觀察得到的現象，和各種可以證明和不可以證明的假設。因為教育是社會化的過程，所以教育必須受到它所存在的社會特有文化因素所制約。教育理論就是這些因素在教育過程中不斷累積之下，經過反省投射而引伸出來的。因此，不論是怎樣客觀和科學化，理論的本身，始終帶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和明顯的社會背景。我們只要稍為加以分析，就不難在任何一個教育理論中，發現它特有的價值觀、自然觀、宇宙觀、人生觀和知識觀等等。這些觀念彼此之間，互相連貫，形成了教育的基本假設，也決定了教育的定義、目的和方法。因此，任何一種教育理論，除了具有以人類共同經驗為基礎的普遍性之外，同時也具有它胎息於自己文化的特色，反映出自己社會的傳統和問題。教育理論並不是憑空而來的。它和其他理論的產生一樣，都是具有特殊背景和原因的。因此，當我們學習和借用一個外來理論的時候，必須注意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並且應該對這個理論作全面的和深入的研討。^③

移植和應用外來教育理論所牽涉的問題，不只是教育目標的接受或教育方法的採納，更重要的是教育理論基礎裡面種種文化觀念的認同。當然，也牽涉到自己社會本身是不是具備充足的條件來應付採用外來理論時的特別需要。許多發展中的國家，爲了要趕上先進國家，於是盲目模倣，卻忽略了這個重要的問題，結

果欲速不達，浪費了寶貴的資源。我們幾個中華民族的社會在教育發展上所走過的彎曲道路和所經驗過的挫折和艱辛，都是諸位曾經深切體會的。

我們必須承認，當前華人社會的教育事業，仍然停留在向外借用和向內移植的時期。這是我們的共同問題。不過，我們在學習和借用的過程中，如果能夠謀求在自己社會中重建文化理論和教育實踐的基礎，就能逐漸脫離抄襲和模倣外國的階段，而可以獨立的、自信的去研究自己社會中的教育問題。只有在經過試驗、反省、修正和發明等程序的教育實踐基礎之上，才能夠發展出以自己社會文化為本位的教育理論和方法。這些由本土生根茁長的學說，不但對自己社會的教育發展最有幫助，而且足以和外國的教育理論互作比較印証，成為中華文化對世界學術交流的一種貢獻。既能重新培植中華民族的文化自尊心和責任感，也為華人社會開創明朗的前途。

中華民族的優點，在於它的堅強性和包容性。在歷史的轉捩點，特別能夠發揮它的適應和新生力量。當前幾個承受中華文化遺產的社會，同時遭逢一次重大考驗。教育是人材培植的基礎和社會建設的根本，今日的教育家們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達成他們的使命。教育家一方面要注意世界的政治、科技和學術的發展，廣泛的吸納新知；一方面也要反求於己，把自己的文化，在世代相傳的歷程中，不斷融會，不斷更生。在幾個華人社會當中，受到西方影響最深，包容異族最多，而距離中華民族母體最遠的是新加坡共和國。這個南洋島國，在孤立的環境中，竟能發憤圖強，最近又把教育列為社會最優先的事業，以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為目的，同時又推行華語的普及運動，更要復興儒家倫理。^④這些措施，對我們來說，都是很有意義的啟發。

這次研討會以《當前亞洲地區華人社會的教育展望》做主題。各地學者所提出的論文共二十七篇，討論的範圍很廣：從不同地區教育實況的報導到未來發展前景的推測，從學制和課程的檢討到教學方法的評介，從人文思想的反省到科學教育的分析，都

是極有意義和有待探究的。我們相信這些論題的闡發，一定能夠加深我們對海內外華人社會教育的共同問題的了解。我們的會議，既是學術性的，也是教育性的。與會的學者，不論是撰寫論文的、或者是參加討論的，都會採取客觀和開放的態度，認識到在學術的領域裡，並沒有一成不變的事例，也沒有絕對不移的立場。我們的幾個社會，雖然有分歧和不同的地方，但是正如馬臨校長所說，我們在同文同種的背景之下，必能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達到學術交流、互相借鑒和彼此合作的目標。

註釋

- ①錢穆著，《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序頁一至四。
- ②Singh, Daljit and V. T. Arasu (ed.), *Singapore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941-84*.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84.
- ③杜祖貽著，《論外來教育理論之限制與今後教育研究之路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報》，九卷二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頁一至十二。
- ④劉蕙霞等編，《儒家倫理》中學三年級課本。新加坡課程發展署，一九八四年。頁四。

國內教育科學研究之現狀和發展

顧明遠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

一、中國教育科學研究走過一條曲折的道路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有着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和教育理論的歷史遺產。產生於二千多年前的《學記》是我國古代教育論著的光輝篇章，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專著。在我國歷史上還有許多著名的教育家，如古代的孔子、孟子、荀子、朱熹，近代的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他們都有過許多教育論著，這是寶貴的教育遺產。他們的教育思想中一切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觀點和論述都應該繼承和發展。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的教育理論還沒有形成獨立的體系，對教育這個社會現象的認識還不夠透徹和完善，對於教育的一些根本問題還缺乏科學的論述。

楊賢江同志是我國第一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論述教育問題的教育家，他為我國教育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徐特立、陶行知等都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們的教育思想豐富了我國的教育科學。

但是，教育科學的大規模發展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事。建國以後，在向蘇聯學習的高潮中引進了蘇維埃教育學，在廣大教育中掀起學習運動。凱洛夫院士主編的《教育學》幾乎普及到城鄉僻野的各級各類學校之中。這種學習運動對於普及教育科學知識，提高教育質量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過了幾年以後發現，蘇聯的教育理論並不能完全解決我國的教育實際問題。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和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和文化歷史傳統密切相關的。我們應該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科學理論體系，走自己的道路。

正當中國的教育工作者總結自己的經驗，探討教育規律，企圖建立自己的教育科學體系的時候，却遇到“左”的思想的干擾。一九五八年，心理學首當其衝，被批判為偽科學；接着教育學被批判，把它說成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的理論，教育科學研究工作被迫停頓。

一九六〇年以後我們曾一度糾正一九五八年“左”的錯誤，總結了建國十二年來教育工作的經驗，先後制訂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日制中學和小學的暫行工作條例；在師範院校裏恢復了教育學、心理學的教學；建立了教育科學研究機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是在一九五六年設立籌備處，一九六〇年正式成立的。與此同時，全國高等師範院校加強了教育科學研究工作，我們北京師範大學的外國教育研究所的前身——外國教育研究室就是在一九六一年籌建，一九六五年正式成立的。至一九六六年，全國已經有教育科學研究機構十五個（其中研究所五個，研究室十個），專業研究人員約三百人。各高等師範院校從事教育學科教學的兼職研究人員約一千五百人。

但是，科學研究機構剛剛建立，研究工作剛剛開始，又遇到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教育科學重新被批判，所有的教育科學研究機構被撤銷，研究工作完全停頓。研究人員和教育學科的教師被下放勞動或分配做其他工作。教育科學遭受到嚴重的摧殘。粉碎“四人幫”後，教育科學研究工作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二、教育科學研究的春天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給我國教育科學帶來了春天。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召開了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教育科學的專家、學者、優秀中小學教師和教育行政部門的負責人共二百六十九人。會議確定了八年（1978—1985）教育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成立了教育科學工作者的學術團體——中國教育學會。一九八三年五月，

召開了第二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制定了“六五”期間（1981—1985）教育科學研究的規劃。在會議期間，又成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至一九八五年底，“六五”規劃已經執行完畢，大多數科研項目已經完成，有些項目將延續到“七五”期間進行。中國教育學會於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連續召開了兩次全國學術討論會，參加的人數都在三百人以上，去年十一月在武漢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學術討論會，收到的論文有一百四十餘篇，這是一次教育科學研究成果的大檢閱。可以說，三中全會以來的短短七年中，教育學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回顧這幾年來所取得的成績，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克服“左”的思想影響，解放思想，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對建國以來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作了重新的檢討和評價，批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教育領域裏散佈的謬論和製造的混亂，清除左傾思想的影響，做了大量的撥亂反正的工作。這個成績是寶貴的，這是建國以來在教育發展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對今後，教育事業和教育科學研究的發展有着巨大的影響。

（2）開展了基本理論的研究。幾年來，教育界對教育理論中的幾個基本問題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討論，如教育本質問題的討論、教育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討論、馬克思關於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問題的討論、發展學生的智力和培養能力問題的討論等等。雖然有些問題還沒有統一的結論，但這些討論提高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例如關於教育本質的討論和教育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討論，使廣大的幹部和教育工作者對教育的社會職能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用這種認識來指導實踐，就把教育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應有的高度，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

（3）擴大了教育學科的研究和建設。長期以來，教育科學搞得很狹窄，普通教育學代替了所有的教育科學，而且只局限於研究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的問題。這就不能全面地認識教育

這種複雜的社會現象 近幾十年來教育科學有了很大的發展，產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領域，如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工藝學、教育評價學等，雖然過去也有過教育哲學、教育統計學、比較教育等，但建國以後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這些學科的研究中斷了。批判了“左”的思想影響以後，放眼世界，就感到我們研究的領域太狹窄了，要全面地認識作為社會現象的教育，有必要開展多方面的研究。因此許多高等師範院校結合課程的改革，着手這些學科的研究和建設，經過這幾年的努力，新開設了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教育統計、教育管理等課程，而且有些學科已經寫出了一批教材和專著。

(4) 壯大了教育科學研究隊伍。我國的教育科學研究隊伍據一九七九年第一次規劃會議時統計，全國只有專業科研人員不到千名。在此之前，許多過去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人員，由於“左”的思想對教育科學的摧殘，都改行從事別的工作去了。三中全會以後掀起了教育科學研究的熱潮，重新喚起了這些同志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熱情和信心，他們紛紛歸隊，這就使得教育科學研究的隊伍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有了較大的發展。中國教育學會和高等教育學會的成立，對團結廣大教育工作者，組織科研隊伍，起了積極的作用。據統計，現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都成立了教育學會分會，總會下面已有二十四個專業研究會。此外，全國幾乎各個省市都成立了教育科學研究所，許多高等院校也都成立了教育科學研究機構。據第二次教育科學規劃會統計，全國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專業隊伍已經發展到一千二百人，加上各種研究會的非專職的研究人員大約有一萬二千人以上。這樣一支隊伍雖然對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講還不夠壯大，特別是專業隊伍的人數還太少，但畢竟有了隊伍，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員是富有長期的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經驗的。有了這支隊伍，再和廣大教師相結合，一定會結出豐碩的果實。

(5) 開展了教育實驗和總結優秀教師的教育經驗的工作。近幾年來各地都建立了一批實驗學校，進行了從單科教學改革到